

■新作聚焦

# 冯骥才《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

## 让蓝色的清流在记忆里永久发光

□杨毅

冯骥才曾以口述史的方式出版了“记述文化五十年”(《冰河》《凌汛》《激流中》《漩涡里》)的系列非虚构作品,讲述自己从“文革”步入社会到新时期投入文学热潮,再到1990年代以来投身文化遗产保护,长达半个多世纪和时代紧密纠缠的生命史和思想史。冯骥才近期出版的《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以下简称《清流》)则将记忆回溯到生命的起点,书写他从出生到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成长历程。五大道连接了冯骥才的整个成长时期,成为他人生真正意义上的起点。这部作品以天津城市地标五大道为叙述的地理空间,在个体生命记忆与天津城市地理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关联,既呈现了作家最初成长的生命史和心灵史,也折射出了天津这座城市独特的地域风貌和文化景观。

五大道如今已成为令游客流连忘返的历史文化街区,但大多数人可能并不了解五大道的由来。这要从天津开埠后,五大道被辟为租界讲起。英国人在1860年天津开埠以后率先设立租界。1903年从清政府手里获得租界内的沼泽地后,1926年开始用海河清淤的泥土在这里填坑修路、建造房屋。短短20年,五大道街区就建立起来,聚集了很多政要高官乃至清朝遗老,还有从事洋务贸易的商人。天津自古是水陆码头,从全国来到天津做生意的人们也聚集于此,其中就包括1920年代先后来天津定居的冯骥才父母。冯骥才感慨道:“我的父亲来自千里之外的浙东,母亲来自鲁西南。如果不是天津突然出现这个崭新的城市机遇,他们仍在各自的家乡生活,何曾有我?他们的姻缘完全根源于天津这座城市,而我是他们姻缘之树结下的果。那么我出生于天津,到底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必然?”

命运将冯骥才置于五大道度过最初时光,冥冥中注定了他与天津的缘分。“我二十五岁之前的人生是完整地在大道上的度过。对于曾经的我,五大道像一条河道,我的生命像一条清流。”这是在天津土生土长的冯骥才对五大道之于自身生命意义的描述,也是《清流》这本书得以命名的由来。显然,当他用清流来形容五大道生活时,就不难想见他早年的时光,是多么透彻明亮,使冯骥才近乎无拘无束地自由成长。在冯骥才的记忆中,自己的童年是一个由阳光、笑声和梦想组成的美妙无穷的幸福混合体。虽然冯骥才幼年时期,经历了日本投降和解放战争,但孩子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感受不到外部世界的碰撞。两个姐姐相继出生之后,作为家中姗姗来迟的长子,幼年的冯骥才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个富裕家庭的宠儿,拥有一段富足无忧、快乐自在的童年时光,天性也未曾受到压抑。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冯骥才慢慢地培养起对绘画和阅读的兴趣。从最初听长辈讲故事,到上小学后对小人书的痴迷,再到跟随先生们学习绘画,冯骥才的艺术天赋也逐渐显现出来。他少年时代对小人书的痴迷近乎疯狂,最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聊斋故事》。从前听姥姥讲的故事,在小人书里得以直观呈现,不仅带给童年的冯骥才无边的知识和想象,甚至通过小人书的桥梁登上了阅读和文学的彼岸。除此之外,读书让他迷上了对插图模仿,并很快通过专业的学习踏上了绘画的道路,以至后来从事古画临摹的生计。

童年经历对人的影响重大而深远,对于作家来说尤其如此。像大多数孩子一样,冯骥才的童年和青年时期,也是在“野蛮成长”中度过的,他并不知道未来会从事什么,但凭着自己的本心去接近和探索热爱的东西,不管走了多



少的弯路,最终都不会失去,而是化为深厚的积淀和谁也拿不走的财富。正如他自幼学习宋代山水,本想报考中央美术学院成为专业画家,却因家庭出身而未能如愿,心灰意冷之时被体育教练看中,又很快因为受伤而离开。但机缘巧合让他最终在书画社谋得生计,而国画也成为冯骥才毕生的追求。冯骥才对此感慨道:“我还总感觉有一种东西在决定着,由于我们无法解脱,便推给了命运。”

这种命运的推动不仅体现在绘画上,也体现在文学上。尽管冯骥才的孩童时代充满欢声笑语,但因种种原因,终究要进入社会经受历练。在新时期刚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之时,冯骥才写过一篇名为《命运的驱使》的文章,认为自己从绘画转入文学的道路同样来自命运的驱使,也是沉潜生活使然,更指出“这不单是个人的命运,也是民族、祖国、同时代人共同的命运”。如果说,绘画更多的是个体心灵的再现和灵感的勃发,那么文学则是作家社会责任感的表达,体现了作家记录历史的良心和使命。

冯骥才将文学、绘画、教育和文化遗产保护称作他毕生从事的“四驾马车”,而从绘画到文学再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轨迹,其实早已端倪。不必说自幼习画,甚至在临摹《清明上河图》时,都唤起了冯骥才对市井烟火和民俗生活的好奇与热爱,间接影响了他新时期聚焦天津历史民俗的地域文化小说,以及接连推出的《俗世奇人》。早在1963年基于天津砖刻调查完成的《天津砖刻艺术》,更成为日后文化遗产抢救的起点,直接用于1990年代的老城保卫战,其传承人抢救史方法至今仍被运用在非遗保护抢救之中。不过这种影响还是后置的,至少冯骥才在当时还没有从事文学创作,更没有遗产保护的概念,做这些既没有外在动因更不是生计使然,“唯一可以用来解释的是出于一种情怀,一种天性,还有热爱”。但神奇之处在于,正是这种无功利的热爱,在将来的人生道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以天津城市地标五大道为空间载体,追溯冯骥才的人生来路,在个体生命记忆与城市地理之间搭建起紧密联结。作品既是作家早年成长的生命史与心灵史,也折射出天津独特的地域风貌与文化景观,饱含对故土与青春的深情回望。

五大道作为天津开埠后的租界一度繁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相对富足,因此冯骥才的童年有着幸福的回忆。但如果在老城和码头,则能看到天津更为市井的民间生活,这是冯骥才在结束早年五大道生活步入社会之后感受到的。两者共同造就了近代天津华洋并立、五方杂处的特点,也形成了雅俗并赏的市民生活并延续至今。因此,作为曲艺之乡的天津不仅有繁荣的俗文化,也有在中西交汇的碰撞中形成的雅文化。事实上,天津这种自近代以来形成的独特地域文化风格,也直接影响了冯骥才对天津的书写——既有以《俗世奇人》为代表的民间文化,也有以长篇小说《艺术家们》为代表的高雅文化。

不妨说,《清流》更多呈现的,是孩子眼中的在五大道度过的快乐童年,只不过这快乐的背后是“时代的峥嵘与家庭的颠簸”,也许是大人故意把我挡在了身后”。而随着新中国成立,五大道的小洋楼渐渐变成“大杂院”,从富人区变成工薪阶层的住宅区,老城的市井烟火气也逐渐涌进五大道,原本华洋并立的两个城区也开始相互渗透……如今作为历史文化街区的五大道,成为近代名人故居的荟萃之地,正在城市更新与改造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然而,不管生活怎么变,至少到今天,这里对于我依然有家的气息。家的气息是人间最深切的气息。”冯骥才不仅在五大道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光,还收获了珍贵的爱情。五大道承载了冯骥才太多的家族和人生记忆,如同发酵数十年的美酒,让年逾八旬的老人再度回味起人生的甘苦。那些记忆如清流般涌动,历久弥香,说到底这是人生的况味。而那些曾经的美好“不如留在记忆里,让它一如一条纯净透明的蓝色的清流永久在那里发光”。

[作者系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讲师,本文系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冯骥才评传(TJZWQN23-001)”阶段性成果]

### 文学名刊 近作扫描

《收获》《上海文学》《天涯》《作家》《芳草》

## 在媒介技术幻觉中寻找真实的生活

□梁敏皓

“AI幻觉”在当下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词汇。它时常在相关讨论中出现,提醒我们应当抽离出另一个自我,去审视那些沉浸于人工智能之中,既兴奋狂热又满怀焦虑的主体,进而看清弥散在新技术与人之间的幻觉。只是,这种警惕似乎来得依旧太迟。因为早在AI技术爆发之前,层出不穷的新媒介技术与“再媒介化”过程,早已如同基因重组一般,将幻觉深深植入日常生活。我们早已不再身处一个仅在现实中偶遇幻觉的世界,而是活在层层叠叠的幻觉之中。我们自以为能抵达彻底驱逐幻觉的真实,却常常在追寻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向更幽微的迷宫。

王手的《喂猫记》(《作家》2026年第1期)是一篇关于微信的小说。微信是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关系的中介,“我”与旅行的妻子、小区爱猫群、业主群,通通依靠这个媒介来确认彼此。但是这种确认却总是令人犹疑,“我”看着妻子发回的照片来描述旅途,再由妻子发布在朋友圈。妻子从不避讳这种“代笔”,却没有人怀疑这种几经转写的生活。我们早已对幻觉习焉不察,甚至下意识地拒绝承认它,这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很可能在无意间给人带来伤害。同期马南的短篇小说《午夜区》写的是网红教师林周周因为一次学生事故遭遇网暴选择自杀,在她坠落的最后时间里,网络将她彻底变形为了另一个人。围观者笃信自己看到的即是真实,然后在目睹与围攻中完成关于自我幻觉的建构。

不过,现实早已被媒介技术困住,将生活改写为无从寻找答案的谜团。这是王刊《风暴》(《芳草》2026年第1期)、王薇《落日谈》(《作家》2026年第2期)等小说呈现给读者的当下世界。主人公们在手机中窥见谜团,但直到小说最后都无法解开。习得与幻觉共同生活的能力后,关于真相的叙事遥远得像是久远的故事。因此,当根据徐则臣《人形砖瓦》(《收获》2026年第1期)中的人物年龄推算失踪的年代时,会发现它距离当下并不遥远,可是这种关于案件及其陈年纠葛水落石出的叙述却已经显得有些陌生。或许,我们早已更加亲近周宏翔《人海孤鸿》(《上海文

学》2026年第2期)里带来的叙事,在对网络中的“诽谤者”层层解码以后,真相似乎近在咫尺,却又急速地收缩为新的谜团。

新媒介技术带来的幻觉并非完全是负面的,在崔君的《冲积扇》(《上海文学》2026年第1期)中,“我”借由像素游戏重新召唤了早已逝去的奶奶。有趣的是,崔君在这个游戏中又设置了另一重媒介,主人公角色不是直接与奶奶发生联系,而是通过一个宠物摄像头来完成“空间/时间”的双重远距离沟通。在这里,幻觉与温情的怀旧时刻紧紧关联,其中蕴含的疗愈性同样令人动容。类似的时刻还发生在王啸峰《跃进电影院》(《作家》2026年第2期)中,蒋安康在患癌后成为一个讲述老城故事的短视频博主。在房伟的《岛世界》(《天涯》2026年第1期)中,幻觉被赋予了更多的期待。在这个关于返乡宅女的故事中,房伟让主人公利用ACG亚文化、VR技术改造小岛的旅游生态,以此试图完成一个“我们可以利用幻觉更好地抵达新的现实”的叙述。在这种期待里,我们才恍然发觉,自己早已置身于更深层的幻觉之中。这种认知模式,就像小说中提及的游戏《我的世界》,仿佛只要“我”这一主体依照图纸行动,就能顺利完成事件、获取相应奖励。

更多的时候,生活在幻觉中的我们,甚至连分辨自己是谁都困难重重。正如《上海文学》2026年第2期傅星的小说《愚人船》。从中我们可以读到,一种新的写作倾向已经开始生长,自我认知混乱逐渐与媒介技术关联在一起。悬尾的小说《见手青》(《天涯》2026年第1期)中徐叹自我危机的产生与陌生女人的来电有关。来电诱发了他曾经体验过的误食见手青的幻觉体验,由此,媒介技术与致幻剂完成了转译。顾遥《猫人记》(《上海文学》2026年第1期)的主人公是一个未来的视频博主,主要拍摄沉浸感素材,供他人足不出户地体验远方世界。这样的视频形式早已屡见不鲜,它们通常以世界各地的“城市漫步”形式出现。虚拟体验带来的只能是“我好像体验过了远方”的幻觉,但顾遥没有止于这种批评,而是笔锋

一转,向读者揭示了“我”的身份。从地球来的“我”也是猫人,能听到人类无法听到的猫人的声音频率,使“我”陷入身份认知的困境,回溯性地将自我与他人想象成为共同体。这种写作机制的转变似乎在提示我们,来自幻觉的自我认知混乱已转变为一种集体潜意识。

幻觉正在改变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费多在《雪崩》(《收获》2026年第1期)中设置了一个颇为有趣的情节。在世界人工智能围棋大赛的决赛现场,主办方专门邀请了特效团队使用AI将整局对弈实时动画化,从而将对弈变成了火鸟与黑鸟对决的视觉奇观。整场模拟在主人公决定肉身迎战后瞬间失效,变成了对弈双方的面部特写,但很快,这种冲破模拟的真实瞬间又被新指令生成的拟象取代。观众面对这些拟象,发表着毫不迟疑的弹幕评论,成为这个时代的隐喻。所有人从来没有如此渴望影像——我们相信看到的才是真实,正因如此,当默音《虚实之间》(《上海文学》2026年第2期)中的主人公身陷AI视频的诬陷时,他的朋友才会觉得,如果不是因为相识多年,她恐怕也会相信视频中主人公说出的话。

当下,幻觉已然成为时代真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悬尾关于电影的小说《侯潮采样》(《天涯》2026年第1期)尤其有趣。他将弹幕、影评、导演自述以及演员采访融入到文字对电影内容的转述过程中。众多的媒介形式汇聚到一起,共同完成了这篇现实与幻觉全然交融的小说。这种交融不再停留在认知上,幻觉真实地进入物理世界。小说中的导演最大限度地拒绝特效技术,坚持实拍。于是,电影改变了现实中作为电影取景地的小镇,让其成为能够被亲身感知的“幻觉/真相”之地。事实上,悬疑小说中主人公前往取景地的“打卡”,在文本外的世界早已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盛行,即ACG文化中的“圣地巡礼”,一种前往动漫取景地的探访行为,比略显沉重的“打卡”更轻盈。这种虚构来自虚构,又不可分割地嵌入了现实。

(作者系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

### 创作随笔

行走者停下来时,会变成另一个自己。这个自己更加安静,是那种不知疲倦的行走之后才能带来的安静。他对超越知识的智慧终于有了些许理解。

我向往成为一个行走者。这些年来,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走向远方,像一种宿命的召唤。这跟我早年接触人类学训练有关。它教会我一套亲密无间的观察方法,还有一种竭尽全力贴近他者的谦卑,一种感知其体温的真诚谦卑。于是,我不再对风景贪婪采集,也不仅仅满足于文化的繁琐考据。我有过一二次的亲密融合——我跳出旧我,与一片土地、一段历史、一种生存方式,在文学的道路上融合,孕育具有多重文化基因的新我。

恍惚间,我又回到了塔什库尔干的那个夜晚。吃完了塔吉克人的手抓饭,走出小店,周围是如此密集的山峰,如刀剑耸立,头顶是亚细亚腹地毫无遮挡的星空,一股奇异的能量压迫下来,我被迫驻足采星,像一个不相信自己眼睛的穴居人。风从瓦罕走廊的缺口长驱直入,带着冰碛与草甸的气息,沁润我的心脾。在那样的时刻,我终于完全忘记了自己,把这无垠的大陆装在心里。

散文集《亚洲之心》,便是无数个这样的时刻,缓慢凝结而成的。

开篇,在德令哈,我独自躺在无人区的戈壁荒原上,那是绝对的孤独,照亮了我自身精神版图上那些未曾言说的空旷与渴念。它是我精神跋涉的等高线,标记心灵曾经出发的海拔。最后一篇,我来到钓鱼城,那座悬在历史悬崖上的孤城,让我怔忡的,是一种时间转折处的悬停。站在合川的峭壁之上,看三江汇流,想七百年前的攻守、智谋、绝望与坚持,那种惊心动魄与当下个体面对算法洪流的迷茫和焦虑,产生了奇异的共鸣。我这才深深意识到,历史并不是被隔绝的过去,它是我们此刻站立的另一维度。每一次对废墟的凝视,都是一次在疼痛中向内的艰难问道。

我也在行走中意外发现了两个重要的地理原点——也就是经过精密测算的具有中心意义的地理坐标。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原点,居然离我家乡西安鄠邑不远。我在疫情后返乡,父母带我跟一个亲人相见,然后开车送我进机场,路过了泾阳县,发现了这个大地原点的存在。那一瞬间,打动我的却是故乡和亲人作为人的精神原点的意义。另一个地理原点是位于乌鲁木齐的亚洲地理中心,它让我深深意识到中国之于亚洲的意义,同时,也逼迫我思考亚洲之于中国的意义。中国从来不会在想象中脱离这块大陆,去另外攀附其他,中国的根脉就扎根在这片大陆的深处,它的花朵与果实也必然属于这片大陆。

一次次穿行在高山峡谷、城市乡野、古迹新景,那种亚洲的体感,逐渐变得具体而磅礴。风沙的走向、河流的改道、语言的嬗变,以及面容上层层叠叠、难以尽述的沧桑,让我沉溺其中,心魂荡漾。亚洲不是地图上色形分明的板块,而是一种混沌深厚、百感交集的复杂意识。它是《十二木卡姆》的欢腾紧迫与佛教洞窟里遗忘千年的静默,是游牧者的天穹与定居者的田园的模糊交汇,是海滨造地新城崛起的彻夜繁华,是中原之土沉淀千年的不朽信仰……我被一次次震撼,但我知道,用文字捕捉什么是徒劳的,我只是体验着这种在中国身体上流动着的“亚洲性”,它抗拒被简单地定义,只是在某张具体面孔的微表情中,在不经意的眼眸一瞥里,被心有灵犀的人情看见。

因此,这本散文集是我用心灵测绘的私人亚洲。它充满了个人的偏好、误读与深情。但我珍视这份不完美,正如我珍视视野上那阵无法被天气预报感知到的带着野草清新味道的风。心灵、文学与地理的遭遇,其意义或许就在于此:最客观的尺度,必然汇入最主观的眼睛;最浩大的空间,必然蜷缩在最秘密的记忆深处。

这些文字,从大地经纬的沟壑之间汲取而来,经过数十年发酵,遴选并收拢于此。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散文。

我心目中的散文不容虚构,不容过度伪饰,是作者气质与灵魂的直接映照。

我曾以为,小说需要架构的匠心,诗歌需要炼字的魔力,而散文似乎最为平易,仿佛只是诚实地说出心中所想,眼中所见便是。不过,走得远了,写得久了,越来越觉得这平易是多么苛刻。情感的浮泛、思想的惰惰、见识的浅薄,在小说中或可被情节的帷幕遮掩几分,在诗歌中也可借意象的氤氲稍作腾挪,但在散文里,却都如海边滩涂一般,在潮水退却后,是棱角分明的礁石,还是已经冲刷成齑粉的沙滩,都裸露无遗。

我们正步入一个文字如工业流水线般被生产的时代。AI的大语言模型,依据浩如烟海的既有文本,能够轻易组合出逻辑清晰乃至文采斐然的篇章。无人认领的文字充斥视野,虚拟的人格环顾周遭。效率与丰饶的另一面,是一种本源性的危险:我们开始习惯阅读没有体温的文字,倾听没有生命经验支撑的见解,我有些担心,我们可能会遗忘那颗因一片星空而悸动、因一抔故土而柔软、因一段往昔而沉思的“人心”。

直而人心,应该是散文在当下最珍贵的使命。在这种境地里,散文应该成为一种近乎本能的固执抵抗。写散文,是把自己作为方法,也是把自己作为目的。它要求我们赤手空拳地去面对大千世界,以血肉之躯去感知边界以外的存在,以未经程序化的心智去思辨知识的板结与僵化,然后,即便我们一无所获,我们也需要鼓起莫大的勇气,将那感性与思辨后的稚嫩,将那不可复制的生命印痕,用自己断断续续甚至吞吞吐吐的声音说出来。

这肯定不是一个愉悦的过程,肯定伴随着袒露自我的惶惑与审视内心的刺痛。但在这敞开与抗拒之中,散文得以诞生,失去主体的写作者重新获得了尊严。我们从语言大模型的生命命运中逃逸出来,我们会发现,每一个用真实的生命经验去观察、去痛苦、去爱、去记述的个体,才是那一切语言与意义的源头活水。

我希望自己的这点点滴滴源头活水,能在某个读者那里,激起一丝相似的共振。我希望那个人合上书,他或地在脑海里从此驻扎下那么一个写作者,这个写作者在这个辽阔到芜杂甚至有时令人失语的世界里,认真地笨拙地看过、想过、感动过,并且试图与人分享那看过、想过、感动过的痕迹。然后,有一天,那个人离开了屏幕,产生了去大地上行走的渴望。

这应该不是一种奢望。

此卷暂歇,前方,大地依然辽阔,星空永远垂顾,总有人群川流不息。总有人渴望创造出新的语言,总有人努力重新定义存在。这亚洲之心,终究也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之心。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作家)

## 星垂野阔,直面人心

——从散文集《亚洲之心》谈起

□王威廉